

发展的合理性观念

王庆丰^{1,2}

(1.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2.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发展”作为现代社会的概念,是指人类社会向人们所预设的美好价值目标前进的过程。发展研究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发展过程,主要研究发展的内容、方法和道路等问题,属于科学层面的研究;二是发展观念,主要反思发展的价值标准,关涉的是对发展进行评价和反思的问题,属于哲学层面的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一方面,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两个普遍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另一方面,它为人类社会确立了发展的价值标准:无论是在人与自然还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维度上,其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消解发展中的“奴役性”关系。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合理性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永恒的指导性意义。

关键词: 发展; 发展观; 发展的合理性;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17)03-0058-08

随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对发展进行科学研究和哲学反思,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显学”。但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由于发展的理论准备不足,并且研究起步较晚,因而较多流行的是西方发展理论的话语,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应当说,西方发展理论的引介和传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其理论本身与这些国家的发展实际之间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位,所以很难用来有效地指导实践。西方发展理论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验建构起来的,它所关注的问题往往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因此,如果我们不加检视地大肆引进和借鉴西方发展理论来建构自己的发展理论,

其实质就是以西方的眼光来观照非西方世界的发展。然而西方发展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一定符合该国的国情和实际状况。总而言之,西方发展理论之“西方”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或社会概念,它决定了西方发展理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念。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理论。而要建立这样的发展理论,在理论层面,必须突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在实践层面,必须和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致力于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开始快速

收稿日期: 2016-08-30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14JJD7200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NCET-13-02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庆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

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也进入了空前活跃期。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世纪末,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侧重于发展内容和发展方式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与之相应,也就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这促使人们对发展问题开始重新认识并进行深刻反省。如果说前一阶段的研究聚焦于发展内容的话,那么第二阶段的研究则进入了反思的层面,即发展观或者说发展理念的层面。由于人们对于发展概念的含义和发展道路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在对发展概念进行详细解析的基础上展开对发展合理性观念的探讨,就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性工作。

一、“发展”概念解析

从本质上讲,发展概念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概念,而不是传统社会的概念。无论是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还是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整个古代社会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发展观念。在古希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衰退史观”,历史被看成是一个衰亡的过程。希腊神话把历史分为五个逐渐衰亡的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与黑铁时代。按照赫西俄德的说法,当潘多拉打开罪恶之盒的时候,黄金时代就突然结束了。从那时起,每个时代都比前一个时代更加粗俗、严酷。黄金时代的“人们像神灵那样生活着,没有内心的悲伤,没有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可怜地衰老,手脚永远一样有劲;除了远离所有的不幸,他们还享受筵宴的快乐。他们的死亡就像熟睡一样安详,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出产吃不完的果实。他们和平轻松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羊群随处可见,幸福的神灵眷爱着他们”^①。希腊神话中的最后时代是黑铁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白天没完没了地劳累烦恼,夜晚不断地死去。诸神加给了他们严重的麻烦”,“父亲和子女、子女和父亲关系不能融洽,主客之间不能相待以礼,朋友之间、兄弟之间也将不能如以前那样亲密友善。子女不尊敬瞬即年迈的父母,且常常恶语伤之,这些罪恶遍身的人根本不知道畏惧神灵。”^②他们信奉力量就是正义,正义为暴力所压倒,真理不复存在。总之,黑铁时代的人类将陷入深重的悲哀之中,面对罪恶而无处求助。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人类

的变化是一个衰退的过程。这种“衰退史观”成了古希腊社会中的主流观念,因此,人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维持现状和防止衰退,而不是发展和进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变化最少的社会秩序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在他们的理想世界观里根本没有持续变化与增长这些观念。

与古希腊的这种衰退论不同,在古代中国,循环论是古代社会历史观念的基本特征。在这种历史观中,历史被看成是一个没有进展的循环过程。中国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的《三代改制质文篇》一文中提出了“三统说”。董仲舒认为,夏代以寅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③。于是夏朝的朝服、车马仪仗等都尚黑,是黑统。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蛰化物,物始芽,其色白”^④。因而商朝尚白,是白统。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⑤。于是周朝一切尚赤,是赤统。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三统”,而历史的发展就是黑、白、赤“三统”循环。董仲舒认为“三统”循环是天意的显示,每个朝代的新统治者受天命为王,都必须按照在“三统”中循环的位置,相应地确定和改变正朔、服色等等。否则就是“不显不明”,违背天志。这种“循环轮回”的历史观可能根源于自然现象的循环过程向社会历史的移植。自然现象是循环的,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循环,植物在冬天枯死而春天又发芽等等。于是,人们从自然现象的循环中发现了历史的命运,形成了“循环轮回”历史观。

西方直至17世纪晚期,“发展”这个词才逐渐形成它的现代含义,开始指一种历经一些可以识别的阶段的有序变迁过程。发展概念是产生于现代社会并专属于现代社会的一个概念。古代社会的基本观念是衰亡和轮回,与此相对,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是进步和发展。新的观念的形成植根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基本上是对已有的生产方式的简单重复。在农牧业生产中,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都只是重复着祖辈留下来的简单的操作,几乎没有任何更新。同样,手工生产依靠的也是“过去”的经验,依靠的是技术的熟练和积累。过去的经验是后来人们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根据,换句话说经验支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意味着:过去高于现在,支配着现在,现在高于未来,并支配着未来。古代社会的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只能产生那种轮回的、

衰亡的历史观念,而不可能形成发展的历史观念。

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断裂。按照阿克顿爵士的说法,现代社会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运转在一个与往昔截然不同的轨道上。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上看,现代社会的技术特征是大机器的使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基础就是从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从经济形态上看,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形式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所发生的本质上的变化就是从传统自给自足的家政性经济转向逐利性经济。所谓经济现代化,就是建构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从政治上看,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化和法制化。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的封建专制走向了民主政治。发展之所以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就在于发展的灵魂中隐藏着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的“价值预设”。发展的目的和价值体现的正是现代性的价值取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技术上的价值指向,是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天然器官的劳动功能,是技术的外化,是科学的发展和应用,是无限增长的劳动生产率;经济上的价值指向是追求市场的无限扩大和经济的无限度增长,从而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政治上的价值指向是社会的民主和法制,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发展的价值,也就是现代性的价值,对发展本身的评价正是以现代性的本性为尺度的。可见,“发展”概念绝对不是一个传统社会的概念,而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概念。

发展概念不同于“运动”“变化”概念。运动和变化只是表示事物同原来具有某些不同,无论是位置上的不同(运动),还是性质上的不同(变化),都不具有“方向”的意义。运动和变化既可以是向这个方向上的运动和变化,也可以是向另一个方向上的运动和变化。对于“运动”来说,时间只是一个外在的因素,至多只是用来计量的一个数量单位,时间并不具有质上的区别,运动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并且运动也不具有方向性要求。对于“变化”来说,事物有可能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但也有可能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但无论产生哪种变化,发生变化的方向都是不固定的。“运动”和“变化”相对于“发展”而言,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具有方向性要求。而发展概念则不仅具有“与原来不同”的意义,而且具有变化“方向”的意义,它是向着某种确定方向的变化。并且这种未来的确定方向被看成是发展的唯一的方向。这个唯一的方向具有价值含义的指向性,即“向

上的”“进步的”“好的”方向。因此,发展概念是一个包含着某种“价值预设”和“价值标准”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是这种确定价值的积累和向这种终极价值目标接近的变化过程。可见,发展概念已经否定了变化方向可以逆转的循环论的“轮回史观”。

在方向性意义上,发展概念与“进步”概念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指向某种价值预设。“进步”概念在同“退步”概念的对立中,表明它是一种我们选择价值的积累,是对选择价值积累程度的标示,或者说就是对社会发展所实现的价值承诺程度的判定。如果实现了价值预设就是进步,反之就是没有进步或退步。而“发展”概念所指向的是这种价值预设的实现过程,是实现进步的“过程”和人的行动。这就决定“进步”是对一个发展结果的判定,而发展不仅强调发展的标准与选择,也强调发展过程本身,即如何实现发展。“进步”是一个价值判断概念,“发展”则不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概念,而且还是一个价值预设以及如何实现这一价值承诺的过程。

发展概念也不同于“进化”概念。进化概念当然也包含着一定的价值预设,因而是指“向上的方向上的变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把生物看作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而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则把进化看作是系统秩序的增加或熵的减少,即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过程。“进化”同“进步”“发展”一样,都包含着某种确定的价值指向。在这一点上,它同发展具有相似的含义。但是,进化并不包含有“意识和意志”的意义。就是说,“进化”并不一定是有目的和意识参与的,更多的是自在意义上的,而“发展”则是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一种体现人的自觉目的和自由意志的创造性活动。发展有别于进化之处就在于它是有意识的行动。发展是全社会或至少是那些有权代表社会的人们自觉努力的结果;而进化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需要自觉意识。因此,进化概念一般只是在描述无意识的自然现象时使用,而在研究有意识的社会现象的进化时,人们一般都使用发展和进步概念。

“发展”与“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一对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这对概念折射出了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发展研究大致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发展过程,主要研究发展的内容、方法和道路等问题,属于科学层面的研究;二是发展观念,主要反思发展的价值标准,关涉

的是对发展本身进行评价和反思的问题,属于哲学层面上的研究。因此,“发展”是一个科学概念,而“发展观”则是一个哲学概念。发展科学解决的主要是“如何具体发展”的问题,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发展才能更快”,以对发展规律的研究和阐释为其主要特征。发展哲学解决的主要是发展的“意义”“价值”和“标准”问题,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发展才是更好”,以对“发展科学”的前提进行批判性反思为其基本特征。

在马克思的发展思想当中既包括发展理论也包括发展观。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关涉到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理解。如果我们在历史观即历史科学的意义上看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现的就是一种发展理论;如果我们在世界观即哲学的意义上去看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现的就是一种发展观。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概念所反映的是人类历史从低级向高级的进步过程,它所关注的是历史总体的发展,它强调的是发展过程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方面,它要为人们提供关于历史总体发展的规律和机制,反对把社会发展看作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随意支配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把人类的自由解放、人向自己本性的复归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凡是违背这一发展趋势的社会发展进程都是非合理性的。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哲学和科学双重意蕴。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双重性质和马克思的双重身份与使命也是一致的。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他还是一位科学家。马克思不仅想解释世界,他还想改变世界。马克思在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和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他还想追求人类的自由解放,并且找到一条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这一切都因为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一位学者,他是一位革命家。

二、发展的两个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科学”的性质,即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科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提出要建立的是一种“真正的实证科学”。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

的发展规律同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放在同等地位。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科学”概念是普遍必然性意义上的科学,而非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科学是一种以对规律的阐释为特征的“知识体系”,所达到的是对事物规律层面的解释。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他还阐释了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相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发展理论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都是“普遍”意义上的。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不是历史总体,而是不同国家的具体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是社会的自发的过程,而是在主观意志、意识、政策支配下的具体的自觉发展,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这两个发展规律则都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那么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表现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这一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性原则: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般规律”进行了简要的表述,但这一简要表述本身却包含着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思索:“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定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⑥在这里,马克思从其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它发展到—定阶段时,便会与它置身于其中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从而导致社会革命。在社会革命中,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方向则必须契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也就是说,在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地方策动革命,无异于唐·吉珂德式的努力。与此相应的问题的另一面是,当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新社会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⑦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服从人们主观意志的随意性的,而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客观的矛盾运动作为基础的。在这些矛盾运动中,生产劳动和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

恩格斯在《十八世纪》中通过对英国社会革命的分析,用实例详尽地阐述了这一道理。在恩格斯看来,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德国的哲学革命,也不同于法国的政治革命,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它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影响更为深远。因为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最初发端于棉纺业,进而扩展到整个工业,最终使整个英国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切都根源于棉纺业领域机械劳动对手工劳动的取代,即该领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恩格斯认为,“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前进运动会传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门。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产生的力量需要营养;新产生的劳动人口带来了新的生活关系和新的需求。机械生产的优越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从而使生活必需品降价,其结果是使工资普遍更低了;所有其他的产品也卖得更便宜了,这样,由于价格低廉,就争得了一个与价格低廉相称的更广阔的市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一切工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⑧因此,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我们到处都会看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意味着:生产技术不仅制约着劳动力的组织的一定形式,而且通过劳动的社会组织,也制约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

本动力。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揭示了现代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虽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资本的增殖”构成了现代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式。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引用亚当·斯密的话指出,“要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价值,就只有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或者提高已被雇用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无论哪一种情况几乎总是必须增加资本。”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工业的数量随着推动劳动的资本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数量的工业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也由于资本的扩大而大大增加。”^⑩可见,资本的扩大或增殖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式。货币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能被称作“资本”。对资本家来说,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可靠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亦即利润的最大化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这一增殖本性及其运动过程进行了充分的揭示。“《资本论》不是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的菜谱,也不是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描绘的乌托邦蓝图。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潜在动态变化的系统研究。”^⑪这种资本主义的潜在动态变化就是“资本运动的逻辑”。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逻辑的本质性内涵:以“价值增殖”为动机和目的的“没有止境”和“没有限度”的资本运动。简而言之,价值增殖构成资本运动的逻辑。

为了揭示这一逻辑,马克思首先区分了“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并指出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前者是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而后者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形式。前者最终目的是消费,即动机和目的是商品本身,货币是中介,用公式表达为“W—G—W”。而在后一种循环中,商品却成为中介,动机和目的则是货币本身,用公式可以表达为“G—W—G”。在“G—W—G”的流通形式中,隐藏着一个深层的秘密:作为起点的货币与作为终点的货币,并不是等量的货币。马克思指出:“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有量的区别。因此,G—W—G过程之所以有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⑫因此,作为货币的资本,它的流通公式并不是G—W—G,而是G—W—G'。其中G'=G+Δ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马克思把这

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 $G-W-G'$,这不仅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而且也是“产业资本”的“运动形式”。“因此, $G-W-G'$ 事实上是直接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⑩这个总公式表明,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并不是无内容的“同义反复”,而是货币成为“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价值增殖构成了“没有限度”的和“无休止”的资本运动的客观内容。《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式——资本增殖的逻辑,这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

任何一种社会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违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这两个普遍性规律。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定义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表达的就是对第一个发展规律的敬畏和尊重。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有市场。自此之后,我国逐渐认识到了资本和市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基础性作用,并最终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是现代社会就离不开“资本增殖的逻辑”这一根本性的社会发展方式。当邓小平把资本和市场同资本主义本身进行剥离的时候,就意味着“资本增殖的逻辑”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式。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重新意识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这一特殊规律和根本方式。

三、发展观的价值承诺

哲学的层面上研究“发展”,最重要的是关注“发展观”问题。“发展观”是对发展合理性标准的探讨,是对“发展”的理解和评价问题。把“发展”作为最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予以研究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仅要对发展规律进行探索,而且还要对发展过程和目的进行价值判断。因此,“‘发展’,这并不只是对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人与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评价。‘发展’与‘发展观’是密不可分的。‘发展观’,是基于对‘发

展’的评价标准而构成的在实践中作出顺序性选择与安排的关于发展的思想理论。”^⑪“发展观”问题的实质是通过对发展过程和目的评价,确立发展的合理性标准,并依据这种评价标准作出对人类有益的行为选择,从而在实践中作出各种顺序性安排。作为人类生存逻辑的“趋利避害”,“利”与“害”的标准如何确认,怎样的行为选择才能使当代人类真正地趋于“利”而避于“害”,怎样的顺序性安排才能使“利”大于“害”,这是当代社会发展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一种合目的性,但是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并不是说历史发展是在人的现实的主观目的支配下发展的,而是说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指向性”。它根源于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性和超越性。马克思关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的自由解放”的论断,就是历史发展的价值目标指向性。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是人的感性活动中价值指向的总体性自发反映。人的感性活动虽然必须遵循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但也具有一种超越外在限制、主宰外在事物的冲动。这就是人的“自由指向性”。“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⑫人的这种自由或理想当然不是对外部客观必然性的背离,但自由的本性也并不是对外部必然性的顺从,而是一种超越的尝试和指向。外部世界的必然性只是对人的自由追求的一种“限制”,是人的感性活动的“自由度”。它表明,人的自主选择只能在这一范围进行,但自由的尺度是一种价值尺度,而非必然性、规律性尺度。历史必然性的“在场”并不意味着自由选择的“缺席”和人的“死亡”。尽管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在哪一个人的现实目的支配下进行的,但它也不是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完全背离,而是在二者的张力中实现着历史的进步。作为人的感性活动中的价值选择是集体性自发表现,历史发展也表现为对人的自由解放的“追求”。因此,人的实践活动不仅仅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它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

发展的合目的性是一种价值指向性,这就意味着发展的合目的性并非一种主观任意性,而是一种合理性的价值承诺。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究竟为发展提供了哪些标准和尺度呢?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所作出的价值承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

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⑩根据马克思所提供的这一线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分析也依从“自然和人类”这一“二分模式”,具体地说,就是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两个维度上展开探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被资本的逻辑架构所支配的。

资本的本性就是增殖性,为了保障资本增殖的实现,资本增殖的逻辑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这一逻辑的起点是资本的投入,逻辑的终点是资本的收益。确切地说,生产投入构成了资本运动逻辑的起点,而商品消费则构成了这一逻辑的终点。获取最大的利润和产生最快的增殖,是资本逻辑的最高原则。在这一最高原则的支配下,生产变成了无限制地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消费成为了奢侈性地消耗更多的商品。因此,“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消费更多的劳动产品”就成了资本增殖逻辑最真实的起点和终点。通过消费拉动内需,意味着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或者说资本实现疯狂增殖的逻辑手段。由此,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发生了颠倒: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的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的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消费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消费主要不再是满足需要的活动,而是变成了对过剩产品的“消耗”和“毁灭”的活动。现代社会被“物体系”彻底控制。处在“物体系”中的人,变成了纯粹的消费机器,以消费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因为只有通过消费掉大量的过剩产品,资本才能实现和完成自己的增殖。可见,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挥霍性消费的基础上,挥霍性消费必然引发对自然资源进行疯狂地掠夺。由于资本的增殖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那么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也将是无止境的,然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系统的恶化,这是现代社会发展方式不可避免会造成的严重后果。

因此,人类只要促进经济发展,就不可避免地掠夺和消耗自然资源。但是,恩格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消除了。”^⑪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最主要的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一种

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只是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物质为人类生存和生活服务的活动,而没有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把劳动过程看成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他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⑫劳动本来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现代社会却把劳动变成了人类改造、奴役、宰制自然的工具,人和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变成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和奴役关系。

这种奴役关系同样也发生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资本逻辑所支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也已经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⑬资产阶级在它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剖析,更加深刻地为我们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物化关系。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⑮可见,商品之所以怪异和神秘,其根源就在于,商品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因此也就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反映成了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所以采取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其根源就是商品拜物教。

因此,《资本论》最本质的任务就是揭露物与物的掩盖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通过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来揭示这一异化的社会关系。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资本增殖的前提成为可能。在G—W—G'的增殖运动中,“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

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②。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雇佣劳动关系的产生,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新时代。“资本”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关系。资本的唯一目的和动机就是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在物的掩盖下所形成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等价交换关系,而实际上是一种剥削关系或奴役关系。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把这种隐藏起来的奴役关系公之于众。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奴役性关系,这是马克思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价值承诺。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前者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理解基础上的,而后者则是缺乏科学基础的不切实的预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不仅仅在于它具有科学性,而且因为它具有内在的价值指向性。这种内在的价值指向性正是它的革命性的集中表现,而否定了它的价值目标指向也就否定了它的革命性。当今时代相对于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只是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变化,而不是其实质的变化。只要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

变,那么,产生于这种时代并直接用于分析这种时代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就没有过时。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规律以及他为人类社会所确立的消解奴役性的价值标准,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合理性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永恒的指导性意义。

注释:

- ①②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5、6-7页。
- ③④⑤董仲舒:《春秋繁露》,凌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7、239、241页。
-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4页。
-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120、140-141、516、195页。
- ⑩詹姆斯·劳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载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4页。
-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176、181、207-208、89页。
- ⑰孙正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9期。
- ⑱《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 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页。

Rational Idea of Development

WANG Qing-feng^{1,2}

(1.Center of Research in Basic Philosophical Theory; 2.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Development” as a concept of modern society refers to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mankind society moves for a beautiful value target predicted by people. Development research mainly covers two parts: development process, covering content, method and road, research in scientific dimension; development concept, mainly reflecting the value standard of development, involving appraisal and reflection on development i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ts have made outstanding theoretic contribution in these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it reveals two universal rule of social development: general rule of man’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established the value standard of development for mankind society, whether dimens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r that between one man and another, whose ultimate aim is to diminish bondage relation in development. The two parts constitute a rational concept of Marxist development notion, owning perpetual value of instruction on man’s society.

Key Words: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View; Development Rationalit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责任编辑:周普元]

[责任校对:刘成]